

秦帝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王宇哲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京 100871)

秦帝国时期的美术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在大型陶塑艺术、石刻石雕艺术、器物塑造技术等方面有着迥异于战国时期的美术风格，而与此后的西汉美术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位学者对秦始皇陵中发现的文物与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及古希腊的工艺美术作品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进行考察，以此作为考古学证据，具体探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秦帝国时期工艺美术造成的深刻影响，具有高度的启发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选取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以及秦“十二金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秦代工艺美术主题，试图对近几十年来有关秦帝国时期工艺美术作品背后所体现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作一梳理总结，以期深入挖掘秦帝国在视觉材料运用上的特征，具体探讨与秦帝国同期的其他文明如何影响了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时期美术风格的流变。在此基础上，本文简要概括相关学者对于秦帝国与同时期其他文明在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上的交流的论述，试图较全面地审视秦代美术背后东西方文化在器物形制、政治制度与社会形态等不同领域广泛的相互影响，以及常被低估的秦代同期东西方各文明间的密切交流。

一、秦始皇陵兵马俑陶塑艺术

享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美誉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秦帝国工艺美术最为人所熟知的典型代表，而与之相关的研究也成为秦帝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研究的起点。1991年，德国学者格尔曼·汉夫勒注意到“（秦始皇陵陶俑群塑）艺术性胜过同期雕塑的艺术品，而且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类型”，从而提出了秦兵马俑的独特形制来源于希腊艺术的可能性。¹汉夫勒注意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对所塑造人物的身体部位进行了极为精细的处理，这在此前的中国陶塑艺术中极为少见，但与以制陶技术著称的古意大利伊特拉斯坎人的艺术作品非常接近。因此，汉夫勒推测秦代的中国工匠很有可能与伊特拉斯坎人有着一定程度的接触，并提出这种文化联系可能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汉夫勒的论证缺乏实证主义的考古学证据，其观点遭到了邱紫华等中国学者的反对和批评。²邱紫华认为汉夫勒在缺乏可靠的依据和细致准确的分析的情况下武断得出了秦俑艺术模仿了希腊艺术的结论，是“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严重判断失误。邱紫华在文中就秦俑雕塑与希腊雕塑在造型重点、面部特征、色彩运用等方面的差异展开具体论证，反对汉夫勒将秦始皇陵兵马俑与希腊艺术联系起来的观点，其质疑与批评无疑是具有力度的。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更多考古学证据的发现，德国著名美术史学家倪克鲁（Lucas Nickel）在2013年发表了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一文，结合艺术史、考古学和文本证据，细致探究了秦兵马俑的艺术风格与秦始皇对陶俑的强烈兴趣是否可能是秦帝国与希

1 （德）格尔曼·汉夫勒著，侯改灵、申娟译：《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

2 邱紫华：《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第50-59页。

腊化文明接触的结果等问题。¹与汉夫勒类似地，倪克鲁注意到秦兵马俑“横空出世”的不寻常之处：在秦兵马俑之前秦国并无任何长期的雕塑传统，而秦帝国前后也罕有与秦兵马俑规模相当的雕塑艺术，并同样将之诉诸于秦帝国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了进一步增加论证的说服力，倪克鲁首先援引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学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所谓的“模件化生产”的概念，着力解释秦始皇陵兵马俑与希腊雕塑在形制上具有差异、前者在比例准确性上显著逊于后者的原因。具体地，在 *Ten Thousand Things* 一书中，雷德侯探讨了制造陶俑的秦帝国工匠从何而来的问题，指出这些工匠正是此前负责制造下水管道的陶工；上述论断的直接证据便是秦宫遗址考古挖掘出的圆形下水管道在大小和比例上都与兵俑的腿部十分接近（图1），制造下水管道的工艺与将泥板卷成管形制造陶俑四肢的技术有着相当程度的类似之处，这正体现了



图1 秦宫1号遗址的排水管（左）与兵俑的腿（右）（采自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9页）



图2 秦始皇墓1号兵马俑（采自Lucas Nickel,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6(3), October 2013, p.11）

¹ Lucas Nickel,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6(3), October 2013.

兵马俑设计制作过程中的模件化特点：工匠使用数量有限、划分明确的模件组装成尽可能形态各异的陶俑，而兵俑的腿正是前述组件的一部分。¹倪克鲁认为，正是由于模件化生产的限制，陶俑的四肢和躯干并不是一个圆融的整体、没有严格遵循解剖学结构，在比例准确性上常常不尽如人意（图2），这解释了秦兵马俑与希腊雕塑形制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条件制作有限使然，并不足以证明秦兵马俑是独立于希腊雕塑艺术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



图3 秦始皇陵K9901坑兵马俑（采自Lucas Nickel,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6(3), October 2013, p.12）

进一步地，倪克鲁在文中具体考察了秦始皇陵东南的K9901号陪葬坑出土的彩绘百戏俑的艺术特征。这些百戏俑的独特之处在于雕塑者罕见地试图将骨骼、关节和相关肌肉准确地表现出来（图3），而纵观同时期的数个欧亚文明，只有在希腊文化背景下，雕塑家才会对人体解剖质量产生强烈的兴趣，而这在秦以前的中国是尤其罕见的。倪克鲁认为，彩绘百戏俑的出土极大地缩小了秦帝国工匠们雕塑创意的可能来源，考虑到中国的工匠几乎不可能“一夜之间开发出在其他文化中需要长期实验和探索的能力”，这无疑是秦帝国兵马俑受到古希腊雕刻艺术影响的重要证据。倪克鲁的上述论断基于翔实的考古学证据，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与倪克鲁长期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的著名学者、秦始皇陵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段清波先生于2015年在《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基于倪克鲁的观点，对秦始皇陵兵马俑背后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加以总结与进一步阐发。²段清波强调，相隔仅数十年的东周列国陶俑、战国晚期陶俑到秦兵马俑之间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存在巨大差异，后者相比前两者有着质的飞跃，这在逻辑上是巨大的缺环，而这样的缺环无法简单地通过秦帝国的资源配置能力加以解释。作者同样选取了秦始皇陵K9901号陪葬坑彩绘百戏俑作为关键的考古学证据，但其论证逻辑与倪克鲁有所不同，着重阐述了彩绘百戏俑所体现的秦帝国时期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具体地，百戏俑中有一尊被认定为都卢寻橦俑，所谓“都卢寻橦”，即两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项顶杆杂技表演，“都卢”是古地名，经考证在今越南北部以南，或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

1 （德）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5-108页。

2 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15页。

附近。这种杂技在秦帝国时期的出现，证明当时业已存在中国西南经缅甸到印度再到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西南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使者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将源自地中海区域希腊、波斯的雕塑艺术及理念带入秦帝国内的推测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段清波援引了2009年一项对秦始皇陵修陵人乱葬坑的体质人类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¹，该研究根据头骨DNA检出一具骨骼属欧洲西部人种，更加有力地确证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工匠向西方使者学习雕塑技术的可能性。

二、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铸造工艺

在对秦陵K0007陪葬坑出土的46件彩绘青铜水禽进行修复的过程中，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发现其在制作中采取了一种特殊的铜片补缀工艺（图4），该发现迅速得到学界的重视，有学者认为这是秦帝国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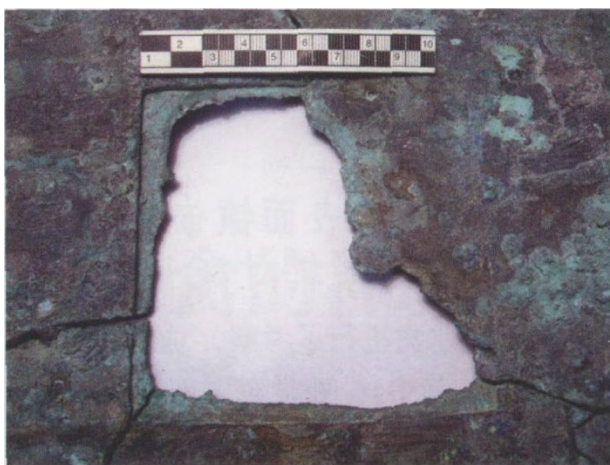


图4 铜片脱落的补缀部位（10号天鹅底部方孔，采自邵安定、梅建军等：《秦始皇帝陵园出土青铜水禽的补缀工艺及相关问题初探》，《考古》2017年第7期，第98页）



图5 希腊博物馆藏青铜运动员雕像及表面的铜片补缀痕迹（公元前340-前330年，采自邵安定、梅建军等：《秦始皇帝陵园出土青铜水禽的补缀工艺及相关问题初探》，《考古》2017年第7期，第102页）

我国学者邵安定等在2014年发表了《秦始皇帝陵园出土青铜水禽的补缀工艺及相关问题初探》一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探讨²。作者根据X光照相技术、显微观察、金相分析、扫描电镜

1 张君、段清波等：《线粒体DNA证据显示秦始皇修陵劳工来自不同的地方》，载《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9日。

2 邵安定、梅建军等：《秦始皇帝陵园出土青铜水禽的补缀工艺及相关问题初探》，《考古》2017年第7期，第96-104页。

等手段获得的第一手证据，判断此种铜片镶嵌补缀工艺与秦汉时期常见的“熔补工艺”和“铆接工艺”完全不同，不存在技术上的传承关系，而更广泛地见于地中海地区古文明的美术作品中。作者指出，世界范围内最早的铜片镶嵌补缀工艺出现在古埃及的青铜雕像上，在公元前5-6世纪的古希腊青铜雕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图5），而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铜器上从未发现。考虑到秦始皇陵青铜水禽上的铜片镶嵌补缀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认为其受到了地中海地区古文明的影响是自然而合理的推测。

在段清波2015年发表的《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作者充分利用邵安定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基于此提出了两点全新的论证，进一步证明秦始皇陵青铜水禽铸造工艺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¹。其一，作者注意到邵安定等测定的青铜水禽成分为铜、锡二元合金，有别于先秦时期的铜、锡、铅三元合金；其二，除铜片镶嵌工艺外，青铜水禽所具有的使用泥质芯撑而非铜质芯撑、连接工艺使用铜焊和榫卯两种、设置工艺为泥梗插入法、颈部与身体分别铸造等特点在中国先秦青铜器上也极少出现，而在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则广泛存在。作者通过以上两点论证，进一步判断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水禽背后有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

三、秦“十二金人”形制

在秦始皇命令下铸造的“十二金人”是秦帝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证据。“十二金人”即秦始皇策划铸造的十二尊青铜人物造像，这些雕像虽然未能传世，但留下了大量的相关文字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一窥秦帝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真实样态。

较早对秦“十二金人”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台湾学者王裕民。在其1996年的《秦十二金人考》一文中，作者认为秦十二金人作为伟大的工艺制品，与秦兵马俑一同代表了秦帝国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并对金人的由来进行了详细考证，对后续的学术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作用。²作者深入分析了《汉书·五行志》中的记载：“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³之前大量研究者认为上述记载接近神话而非史实、似为伪说，但王裕民认为在大量史料记载互证之下，没有理由认定十二金人身着夷狄服饰的记载全系编造，而应当大致是真实的。倪克鲁在后续的研究中肯定并援引了上述说法，并进一步引证其他相关史料，认为秦始皇下令铸造的十二尊铜像是中国与希腊文化接触的重要证据。⁴倪克鲁认为，十二金人的形制及其由青铜铸造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希腊背景。其一，同时期的较重要的希腊雕塑经考证均为青铜铸造，而考古学证据已经证明秦始皇陵中的铜车马采用的是希腊的铸造技术；其二，作者认为“十二金人”与十二个奥林匹斯神相对应，可能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来的文化交流，具体证据见于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著作：“……（亚历山大）首先建立了十二个神的祭坛……建立一个英雄式的营地，然后给当地人留下身材魁梧的证据，显示出巨人的力量。”⁵这一记载与前述《汉书》中的记载高度吻合，合乎逻辑地把秦“十二金人”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

1 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8-15页。

2 王裕民：《秦十二金人考》，《秦文化论丛》1996年辑刊，第265-288页。

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2页。

4 Lucas Nickel,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6(3), October 2013.

5 Diodorus Siculus, *Bibliotheca Historica*, 17.95.1-2.（所引内容由笔者译作中文）

段清波在《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沿袭了上述观点，认为“遇大人”的相关记载透露出双重含义，其一是秦人在帝国边界遇到一支非黄种人的军队，其二是这些人带来了铸造巨型青铜造像的技术。¹作者基于此作出了与倪克鲁类似的推断，认为这些作为秦十二金人原型的“大人”很有可能是亚历山大东征军队中的马其顿帝国公民。至此，关于秦十二金人的考古学和文献学证据基本自洽，较为确凿地解释了秦“十二金人”的来源，使之成为秦帝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证据。

四、总结

本文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以及秦“十二金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主题进行了尽可能充分的文献综述，试图对近几十年来有关秦帝国时期工艺美术作品背后的中西文化交流逻辑作一梳理总结。除上述工艺美术主题外，秦始皇陵封土内高台建筑形制、秦兵马俑地坑内条形砖技术渊源、拱券及叠涩技术的应用、铜车马铸造工艺以及秦始皇时期石刻石雕工艺等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均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秦帝国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秦帝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不仅限于工艺美术范畴，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相互影响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正如学者段清波所提出的，以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为秦帝国带来了具有希腊文化色彩的工艺美术，更重要且更核心的是对秦帝国治国理论、国家政体、管理措施的全方位深度影响。²这些超越物质层面的因素在史学研究中常常隐而未现、难以进行实证，但通过对秦帝国工艺美术作品风格流变的研究，可以从侧面有力地佐证秦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也正是本文所关注论题的现实意义之一。

1 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8-13页。

2 同上。